

教育部“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研究”系列专著

# 世界经济波动理论

## （第四卷）

李天德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 世界经济波动理论

(第四卷)

李天德 等 著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05&ZD006)研究成果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讨论了中国预警机制建设问题,共七章。本书首先阐明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条件下中国经济监测预警的方法体系,探讨了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框架。然后,本书分析了全球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机制,以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中国财政金融指标的联动关系,并从进出口的视角分析了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中国对外经贸的关系,探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预警模型的构建,深入讨论了相关的监测与预警模型,以及现有监测预警机制的扩展。最后,本书提出了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政策措施,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

本书适合从事世界经济研究的学者阅读,对于制定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济波动理论.第4卷/李天德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4402-1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波动—研究 IV. ①F1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4680号

责任编辑:张 宁 / 责任校对:徐榕榕  
责任印制:阎 磊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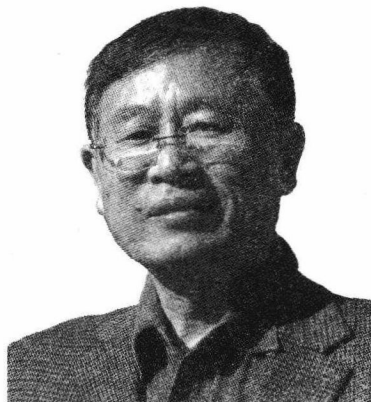
字数:287 000

定价: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作者简介

李天德，男，河南郑州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经济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技术与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重大问题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西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金融理论。

**主要著作：**《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世界经济学》、《WTO 与中国经济》、《欧盟区域政策及其效应研究》、《西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析》、《资本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探索》、《世界经济研究》、《洗钱与反洗钱的金融学分析》、《对外经贸统计概论》、《国际金融》、《货币供给调控论》等。

**承担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石油安全视角的海外油气资源接替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洗钱与反洗钱的金融学分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急项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等。

# 总 序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运行中的波动起伏是其内在规律。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大发展和大波动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经历了一个由相对独立到相互依存的演变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强。近现代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的波动始终遵循着一定的周期性规律，以周期性波动为主线，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非周期性波动展开。因此，研究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对于我们掌握世界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和非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构建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有效预警机制，以史为鉴、预测未来，在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中及时把握先机，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增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外部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对“世界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西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的跨国公司行为及政府反应机制、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的危机管理和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等四个部分展开研究。

## 一、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传导机制分析

这部分由第1卷1~4章组成。在第1章中，我们评述了国内外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理论，界定了“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概念——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是由“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引起的”，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影响因素”则是在经济周期运行中干扰经济正常波动、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波动轨迹的经济、政治和自然因素。非周期性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一是使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发生变化；二是使周期性因素决定的经济扩张或收缩的持续期发生变化。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考察发现，世界经济周期变动中起主导力量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主导国）。由于经济周期主导国在每轮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特征、变动趋势的把握是我们掌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依据。经济周期主导国一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当时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国；第二，它有完善通畅的贸易、金融等传导机制；第三，它是世界经济的霸权国。

第2章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本质规律的把握,在研究两类波动如何生成和传导的基础上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非完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主要通过投资生产和货币政策两大经济链条进行传导。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传导主要通过价格链条、金融链条、贸易链条进行。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组织是世界经济波动协调机制的重要主体,国际分工是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首要条件。国际经济协调对于平抑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起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减弱经济危机在国际间的传递和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第3章从世界经济发展与金融传导效应的分析入手,通过分阶段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经济波动和金融传导的相关程度分析,发现不同阶段世界经济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动中的金融传导效应具有不同的特征。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金融传导机制主要由利率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以及资本市场传导机制构成。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拐点是“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是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海啸的分析,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变化。

第4章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与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的分析,发现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步性在不断增强,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时间跨度在延长、幅度在扩大,世界经济危机与波动造成的破坏力在加大,上升阶段在变短,复苏阶段在延长,非对称性在增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之间在较高的置信度水平下存在着双向或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影响国际贸易波动的同时,也在受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波动的周期性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明显的滞后关系,国际贸易波动的周期起始时间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表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引起国际贸易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被动引致的国际贸易波动加剧和传递了世界经济的波动,使得世界经济复苏期延长。通过从世界范围内对FDI、能源价格与世界经济波动关系的考察,发现世界GDP和世界FDI之间存有协整关系,世界FDI增长变化与经济周期存在正相关及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世界FDI增长变化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具有协动性关系,表现为两者周期时滞短(1~2年),同时,两者波动幅度大致相同,周期跨度大体一致,均为10年左右。能源价格变动作为影响世界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成也有着明显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同步性不是很稳定,在不同时段上表现出的协同性差异较大,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越来越深,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波动又表现出逐渐增强的协动性趋势。

## 二、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的跨国公司行为及政府反应机制的分析

这部分由第2卷1~3章组成。在第1章中,我们分析了世界经济周期的新特征和长周期的演变与跨国公司的行为。通过对近50年跨国公司的现实发展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已演变成国际化生产和全球化生产的经济组织,跨国经营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能影响到跨国公司在一国或多国经营的环境、投资策略、区位选择、跨国转移定价和对企业技术研发与转移。而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贸易、金融活动、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等经营活动充当了世界经济波动的传导主体。正是跨国公司的这种反周期行为,使得跨国公司将其联系较紧密的国家带入经济波动的漩涡,进而把世界经济“震源”的波动因素和经济表征“接力式”地不断传递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对跨国公司超国家规制的实现路径必须从国际间的双边协调、区域多边协调、全球性缔约等多方面和多层次进行考虑。对跨国公司规制的手段可分为法律手段、行业自律,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第2章讨论了世界经济周期性、非周期性波动与政府反应。通过对世界经济波动与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机制的分析,发现政府政策的作用几乎与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发生不存在单向关联。但是,世界经济非周期性的发生却往往是导致政府政策变化的主要因子。从危机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既是危机管理中政府依法执政的重要保障,又能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效率并减轻危机造成的破坏程度。通过对政府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反应机制研究,我们认为,政府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应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建立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预警机制;二是依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采取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方面,由于带有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对一国的影响,可能演变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政府应整合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和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通过构建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政府反应模型,政府应依据突发事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潜伏期、征兆期、爆发期、缓和期和消除期5个阶段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应对策略及措施。

第3章分析了世界经济周期和非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的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其经济内部的传导机制和通过传导而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外在的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外在冲击机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构成了中国集权计划体制下经济强幅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幅的降低,既源于内在传导机制的良性转变和影响程度的提高,又源于外在冲击的改进,以及不规则冲击影响的减弱。在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时发现,宏观经

济总量的协同性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波动趋势。因此，我们计量了七个宏观经济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超前、滞后期的相关系数，以判断经济序列周期成分的交叉或时差相关性，进而揭示相关宏观经济序列具备顺周期还是逆周期特性。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分析时发现，中国经济周期不存在显著的深度型和尖峰型非对称性，但是在 1990 年之后出现了显著的陡升缓降型非对称性，从而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了拖长的尾部。通过利用具有持续依存特征的 Markov 转移模型（DDMS 模型）对中国经济周期的持续依存特征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周期在收缩期具有正的持续依存性，而在扩张期则并不具有持续依存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分析发现，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中华经济周期。鉴于此分析结果，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运用 Markov 区制转移模型，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区制依赖特征以及美国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存在依赖于经济周期区制的“门限性质”——两地在“共同适速增长”区制的协同程度最高。同时，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隐含了美国作为两地之间经济冲击的传递渠道以及两地共同的外部冲击源的影响。当剥离出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后，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较为微弱。通过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分析进一步发现，目前并未存在显著的“东亚经济周期”，然而各种分析方法都一致地证实确实存在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东盟次区域经济周期。而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则显示出较为独立的经济周期形态。通过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同变化和交互影响的分析发现，当考虑美国经济作为东亚各国共同的外部经济冲击源以及冲击传递渠道的影响时，中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周期的区制依赖相关性并不明显。相比较而言，中国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东盟成员国的周期协同性相对较高。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程度要大于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程度。在对中国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分析时发现，中美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但总体而言两国经济周期并不具有明显的协同性。

### 三、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的危机管理分析

这部分由第 3 卷 1~12 章组成。在第 1 章中，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危机管理的背景和重要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认识波动，掌握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波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关键在于如何透过波动的表面现象分析其背后的内在规律，采取适应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方式，在高峰中防止经济下行，在低谷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二是掌握波

动,从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中探究世界经济均衡和非均衡发展的实质,防范国别经济的冲击。通过对世界经济波动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可以挖掘世界经济均衡和非均衡发展的实质,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波动预警机制,提前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降低世界经济波动的辐射范围和波动幅度,促进国别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驾驭经济波动,化危为机。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发展高位下滑的背景下,通过对导致世界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利于我们了解、掌握并最终驾驭世界经济波动,以便有效规避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充分利用危机带来的全球产业转移、重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实现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大国崛起。

第2章分析了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危机的逻辑机制,包括非周期经济波动的成因等。我们认为,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主要是经济的外在冲击机制作用的结果。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系是: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周期造成了破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历史,主要包括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石油危机、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比较了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国家的非周期性危机管理模型。

第3章从危害和积极影响两方面分析世界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安全。我们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国家经济主权是指主权国家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和对外经济事务的最高权力,包括国家对本国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金融和保险等重要服务行业,以及对信息技术产业的主导权力。国家经济安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和伤害,国家经济在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中基础稳固、健康运行,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卫力。当面临国内外的干扰甚至打击时,有足够的抗衡和抵御力量,能够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不致因为某些问题而使整个国家经济受到重大挫折。二是指国家经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和较好的赢利机会,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能够采取主动措施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有四点:一是一国难以独自调控经济波动;二是一国经济主权面临挑战;三是引发危机加速传染;四是引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积极影响有三点:一是导致产业结构改善;二是导致贸易结构改善;三是导致政府调控能力增强。

第4章讨论了世界经济波动中中国经济安全的维护。通过对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安全影响的双重性的分析,认为世界经济波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为了防范世界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四点措施: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方面,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 继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完善财税体制, 深化金融改革; 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二是坚持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经营方针。对外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 但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进经济增长, 是有局限性的。三是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四是构建完善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同时认为, 可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以及国际合作与协调来减弱世界经济波动的各种渠道。在此基础上, 具体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安全机制建设, 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安全审议和评估机制、中国经济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中国经济风险控制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危机的处置机制。

第5章从预防性对策、预警性对策、处理性对策等方面讨论了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对策系统。我们认为,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预防性对策应包括: 开展国民国家经济安全教育, 增强国民国家经济安全意识; 健全和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 制定长期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规划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性对策应包括: 建立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机构; 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 保持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的常态运行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处理性对策应包括: 需求冲击的处理对策、外资入侵的处理对策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的处理对策等。在世界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方面, 具体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经济安全、世界石油价格波动与我国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建设、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我国对外投资战略选择等问题。

第6至9章分别从金融风险、汇率风险、银行风险、股市风险四个方面阐释了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在金融风险方面, 通过对开放经济下的非确定性与我国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发现, 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 是由于本身经营失败、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与金融机构的直接行为相比, 金融市场与真实经济之间的宏观经济联系更为广泛。开放经济条件下, 一国国内经济均衡不仅要受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且还要受到国际间物品与资本来往的影响。在汇率风险方面, 分析影响人民币汇率风险生成的宏观经济因素时, 应重点考虑货币量、物价和国际收支三个经济变量。对中国货币危机预警分析时, 可选用“因子—Logistic 回归模型”和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流动性、实质部门、货币部门、财政部门和外债等七大类预警指标。在银行风险方面, 银行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汇率的变动、贷款国的信用、经营管理的状况以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非周期性经济波动会加剧银行风险, 继而转化为银行危机的传导, 其中可分为国内传导与国际传导两种。在股市风险方面, 非确定性因素对于股市危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们对于股市未来的预期实现的, 自然灾害、战争和突发政治事件对经济本身和股市危机有直接的影响。人们对于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和对未来股市的不确定性的恐慌也是导致股市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10章通过对经典金融危机预警方法和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新增

指标体系的分析,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了指标体系的设计,建立了开放式的中国国家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相应的临界值和安全区间,这为促进中国国家安全预警发展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和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的开展,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同时,也为中国在不同时期进行国家安全形势的自评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国家当局能够更加合理地运用国内有限资源进行金融危机的防范,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第11章通过对中国实体经济危机管理的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发现中国没有对经济危机预警的系统研究,更没有专门进行经济危机预警管理的部门。为此,我们对目前所使用的ARMA模型、ARCH模型、VAR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MCS模型、贡献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判别分析法模型、NN模型、KLR信号分析法、概率模式识别模型、灰色预测模型等宏观经济预警模型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实体经济危机管理制度建设进行了探讨,认为实体经济危机管理系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主要包括综合管理系统、预警信息系统、法律系统、部门管理系统(政府、企业)等几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内部由各种各样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构成实体经济危机管理这个大的综合系统。

第12章讨论了当前世界经济波动的特点、发展及中国应对策略,我们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波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即: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表现明显;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增强;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愈加重要的地位并表现出明显相似的波动特点。对世界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有四点,即: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不同经济周期走势的下降叠合阶段;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阻碍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短期内难以调整;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导致了世界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复苏通道,不会出现二次触底趋势。短期内中国的通货紧缩会趋平稳,其减缓的强度将视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而随时发生变化。从中国在本轮世界经济周期中所起作用 and 影响来看,中国经济不会改变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基本形状,但会使世界经济在原有运动轨迹上显示有中国影响的小幅波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处于下滑阶段的世界经济起到了“制动阀”的作用,减小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振幅。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在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主导力的同时,应针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合理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着力打造绿色经济体系。

#### 四、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分析

这部分由第4卷1~7章组成。在第1章中,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条

件下中国经济监测预警机制及其方法体系的分析,认为经济监测预警的发展,包括早期萌芽、再度兴起、发展成熟、走向国际化等四个阶段。经济监测的常用方法,包括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在经济监测预警中的应用。在监测预警体系的设计与构建中,我们首先对转折点进行了监测和预警,接着进行连续性的监测和预警。在转折点的监测和预警中,我们分别进行了移动平均分析、均线离差分析、基于 5 期移动平均的轨道分析和基于 10 期移动平均的轨道分析。而在连续性的监测和预警中,我们分别对相对强弱指数和随机指数进行了预警分析。由于我们所采用的数据均是来自世界银行的年度数据,因此,在引用具体数据时,我们进行了 HP 滤波处理,以消除长期趋势、不规则变动等的影响,然后再对得到的各变量的周期波动项进行具体分析。

第 2 章通过对全球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机制的分析,发现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途径主要包括货物贸易、金融、资本流动、直接投资等渠道,因此,我们主要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这三方面来探讨经济周期在国际间的传导机制,着重分析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向中国传导的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政策渠道。国际贸易主要通过需求的溢出效应与价格变动两条途径来传递经济周期性波动。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及内部贸易渠道向中国传导经济周期性波动。国际金融主要通过传统金融市场的信贷、利率、汇率渠道和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与“托宾 Q 效应”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来传递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的调整来对经济进行引导和调节。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对其自身经济体内在的不平衡性产生作用,也对经济体外的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效应。

第 3 章和第 4 章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联动关系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后期,中国与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协同性明显强于改革开放前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并导致中国 GDP 的周期性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高度协同。1978~2005 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在整体上反向运行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期的情况所致。通过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宏观金融指标周期波动的联动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后期,中国金融市场的周期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比改革开放前期更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此外,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联系更紧密,其中货币供应量(M2)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最为密切,外商直接投资净值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改变的最为明显。

第 5 章通过对中国出口周期性波动与全球 GDP 周期性波动的关系以及中国出口周期性波动与全球 GDP 的构成部分周期性波动的关系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出口周期性波动与

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协同性明显增强，但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波动周期要短于全球经济指标的波动周期。在全球 GDP 的各构成部分中，中国出口周期性波动与全球进口总额周期性波动之间的同步性最高，与全球投资总额周期性波动之间的同步性最低，与全球消费总额、全球政府支出总额保持了较高的同步性。中国出口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协同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步性最高，比与低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步性要强，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相比存在一年左右的滞后期。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出口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协同性显著提高。通过对 1978~2005 年中国商品及劳务进口、全球 GDP、全球消费总额、全球投资总额、全球政府支出总额和全球进口总额等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商品及劳务进口周期性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协同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后期，在全球 GDP 的各构成部分中，中国商品及劳务进口的周期性波动与全球消费总额周期性波动之间的同步性最高，其次是政府支出和投资，关联度最低的是世界进口。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协同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变得越来越高，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与中国商品及劳务进口周期波动相比存在一年左右的滞后。

第 6 章探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预警的模型。通过分析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与预警模型，我们对 1960~2005 年的全球 GDP 的时间序列进行了解析，认为从 1960~2005 年，世界经济总的变化趋势是上升。在此基础上，运用移动平均、均线离差、图像的宏观描述、图像的经济意义、离差 GXLC<sub>-W</sub> 的正态性以及波动轨道分析对全球 GDP 的转折点进行了监测和预警，认为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率在 1970~1980 年这个时间段内出现过两次过高的情况。在 1980~1985 年又迅速回落，出现经济不景气的情况。此外，整个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率从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变化比较大，经济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从 90 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经济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局面。在中国与全球经济联动的监测和预警分析中，我们分三个层次展开，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选取主要的全球经济指标进行构建；以中国经济有着明显联系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例，选取中国经济较为敏感的指标进行构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中选取相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从而在更具体层次上构建中国经济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预警机制。

第 7 章讨论了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政策措施，提出了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四点政策：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战略，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核心；发挥政府和市场双优势效应；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生

态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运行的润滑效应。

总之，《世界经济波动理论》（1~4卷）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的理论专著，其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九个方面：第一，提出并详细分析了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概念，拓展了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围；第二，归纳了世界经济周期主导国的特征，分析了未来世界经济周期主导国的变动情况；第三，分析了金融发展在世界经济波动中的强弱相关性，发现了金融传导机制在经济波动中与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第四，发现并厘清了贸易波动、石油价格变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规律性；第五，揭示了跨国公司行为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互动机制，论证了跨国公司超国家规制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第六，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效应，指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内外传导机制及协调性；第七，构建了世界经济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安全机制；第八，提出了政府应对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危机管理机制，构建了我国实体经济危机预警系统；第九，建立了基于世界经济周期性与非周期性波动下的中国经济预警机制。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经济理论方面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与危机管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新问题不断涌现，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之日臻完善。

李天德

2012年4月28日

# 目 录

## 总序

|                                              |     |
|----------------------------------------------|-----|
| <b>第 1 章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条件下中国经济监测预警的方法体系</b> ..... | 1   |
| 1.1 经济监测预警的历史发展 .....                        | 1   |
| 1.2 经济监测的常用方法 .....                          | 7   |
| 1.3 监测预警体系的设计与构建 .....                       | 13  |
| <b>第 2 章 全球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机制研究</b> .....          | 19  |
| 2.1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向中国传导的贸易渠道 .....                | 20  |
| 2.2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向中国传导的金融渠道 .....                | 23  |
| 2.3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向中国传导的政策渠道 .....                | 25  |
| 2.4 小结 .....                                 | 27  |
| <b>第 3 章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联动关系的研究</b> ..... | 29  |
| 3.1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经济总量周期波动的联动分析 .....          | 29  |
| 3.2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其他经济指标波动的联动分析 .....          | 35  |
| <b>第 4 章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财政金融指标联动关系研究</b> .....  | 45  |
| 4.1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宏观金融指标周期波动的联动分析 .....        | 45  |
| 4.2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财政指标联动分析 .....               | 54  |
| <b>第 5 章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对外经贸</b> .....          | 55  |
| 5.1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出口 .....                     | 55  |
| 5.2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中国进口 .....                     | 58  |
| <b>第 6 章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预警的模型构建</b> .....  | 64  |
| 6.1 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与预警模型 .....                  | 64  |
| 6.2 中国与全球经济联动的监测和预警模型 .....                  | 86  |
| 6.3 中国现有经济监测预警机制扩展分析 .....                   | 104 |
| <b>第 7 章 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政策措施</b> .....           | 122 |
| 7.1 以绿色经济为发展战略,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核心 .....              | 122 |
| 7.2 发挥政府和市场双优势效应 .....                       | 133 |
| 7.3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144 |
| 7.4 构建和谐生态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运行的润滑效应 .....        | 170 |
| <b>参考文献</b> .....                            | 194 |
| <b>后记</b> .....                              | 209 |

# 第1章

##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条件下中国 经济监测预警的方法体系

### ■ 1.1 经济监测预警的历史发展

#### 1.1.1 国外经济周期监测预警的历史与现状

西方国家对经济周期的监测预警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监测预警和对社会总供求状态的监测预警两个方面。其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萌芽阶段、再度兴起阶段、发展成熟阶段、走向国际化阶段。

##### 1. 早期萌芽阶段

西方国家对经济周期的监测预警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期。1888年，法国经济学家福里利在其《社会和经济气象研究》论文中，用黑、灰、淡红、大红几种颜色来测定法国1877~1887年的经济波动。然而，早期的此类研究普遍缺乏定量测度和数量上的精确分析，随意性较大。因此，指标的认可率并不高，实用性也不强。事实上，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随着大量信息资料的积累和统计分析方法的进步，从20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大规模的对建立景气指标系统的研究。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同时危机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于是西方经济统计学界开始了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测定、分析和预测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各国逐渐积累了可供分析的一批经济统计资料，同时，经济统计学家通过大量地借鉴数学、生物学及人体测量学中的方法，使得统计分析方法不断进步，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处理大量经济

统计资料的能力。

美国统计学家巴步森（Babson）于1909年设立了巴步森统计机构公司（Babson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景气观测机构。他还发布了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状态的第一个指示器——巴步森经济活动指数，是巴步森统计公司为投资者和企业家进行商情变动观察与分析提供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期，西方国家进行了众多的景气监测研究。1911年，法国建立了常设的经济恐慌委员会机构，以编制各类商情指数向政府提供关于经济危机的预警报告。同年，美国的布鲁克迈尔经济研究所（Brookmire Economic Service）编制并发布了关于股票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货币等方面的景气指标。

美国哈佛大学的珀森斯教授为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定量测度，于1915年编制了“经济晴雨表”，并于1917年在哈佛大学设立了经济调查委员会（Harvard Committee on Economic Research）。该委员会由珀森斯主持研究工作，在对1875~1913年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工作后，编制了“美国一般商情指数——哈佛指数”（Harvard index of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Harvard index chart）。它从大量的经济统计中选择与经济周期波动在时间上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的经济指标，进而发现了经济时间序列相互间存在着比较有规律的超前滞后关系，并将选上的17个指标分为三类，分别合成三个指数（也称为三曲线）：与股票市场活动相关的投机指数（A曲线）；与生产、物价、商品交易活动相关的商情指数（B曲线）；与金融市场相关的金融指数（C曲线）。其中，B曲线从生产、物价和商品交易方面测定了当前的经济状况，从而代表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动向。从这三条曲线的时差相关关系可以看出，A曲线比B曲线超前10个月（A曲线延迟10个月时，和B曲线的相关系数是0.63），而C曲线比B曲线滞后四个月（B曲线延迟四个月时，和C曲线的相关系数是0.8），因而A曲线的变动能预示景气变动的方向。

哈佛指数对美国1919年的繁荣及1920年下半年急剧衰退的情况提前数月就做出了预测，又在1920年年底的恐慌期时，预测出1922年4月景气开始回升，经济将处于恢复阶段。这些正确的预测，尤其是A曲线均能相对于这几次经济波动的峰、谷点超前变动，使得哈佛指数名声大振，在当时信誉和评价极高。相对于其他指数，哈佛指数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更对景气指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在哈佛指数的影响下，都用类似的方法编制了本国的“经济晴雨计”以反映本国经济运行的状况。

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佛指数三曲线在时间上的规律性变得不明确起来，当西方国家于1929年爆发经济大危机时，哈佛指数却指示经济将继续扩张，在经济预测上出现了严重的偏离，从而使哈佛指数的威信受到沉重的打击，虽然后来对采用指标进行了几次修改，但终因效果不佳而于1941年中断使用。由此，哈佛指数走向衰落，这也标志着景气监测早期阶段的结束。虽然哈佛